

# 導言

劉維開

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

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執行「中國遠征軍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研究計畫」，由專家組建團隊，邀請青年學子參與，定期討論，凝聚共識。研究團隊經過數十次的學術討論、三次大型研討會，將研究成果出版，編成「中國遠征軍系列叢書」。參與研究計畫的博碩士研究生經過長期討論薰陶，也分別從宣傳、外交等角度，發表論文，頗有可採。本書集結計畫團隊的中、青年學者的主題論文，藉由多元觀點，檢視戰場實況與戰事報導的虛實交錯，嘗試還原遠征軍史事。全書分為「戰爭宣傳」與「外交角力」兩部分，共收錄七篇論文。

首先，「戰爭宣傳」以中國遠征軍與中國駐印軍的宣傳為主題，共收錄三篇論文。

楊維真撰寫〈從《緬北之戰》到《黃河青山》：史家黃仁宇筆下的第二次緬甸作戰〉，以倡導「大歷史觀」聞名，著有《萬曆十五年》、《中國大歷史》等著作的歷史學者黃仁宇早年所撰《緬北之戰》以及其晚年所書寫《黃河青山：黃仁宇回憶錄》，兩書中對於 1943 年第二次緬甸作戰的敘述，進行比較研究。指出兩書雖然同為國軍第二次緬甸作戰的重要史著，但是兩書切入及觀察點並不相同：《緬北之戰》著重於戰役的進行及戰鬥的細節，而《黃河青山：黃仁宇回憶錄》由於係事後回憶，則更呈現作者對戰爭的感懷及官兵心理較深層的描述。他認為黃仁宇親歷第二次緬戰，並觸及基層戰鬥部隊作戰實況，兩書實可補正史記載之不足，並值得治戰史者參考。

陳英杰的〈國民政府在重慶時期的宣傳：以遠征軍為例〉，從宣傳的角度探討國民政府為號召知識青年從軍所做的努力。文中提到「對於在前線作

戰的遠征軍，從第 11 集團軍在滇西的經歷中，可以發現一方面在部隊中有美方軍官或記者隨軍，其可自行提供文稿、照片，另一方面因安排有中方的譯員，其大多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，也可透過投稿等方式，提供前線訊息給媒體。同時，隨著戰況逐漸有利，中央社也派員隨軍採訪，將戰果在第一時間回傳給重慶方面，再對外發稿，供中外媒體採用。」可以與前文中提到的黃仁宇《緬北之戰》一書相呼應。作者在結論中認為國民政府在徵集組訓遠征軍期間，黨政軍各宣傳部門，全力配合動員，徵集的成果超乎預期。中宣部國際宣傳處編撰科和攝影科，大量的翻譯稿件和照片，提供許多媒體採用，對於增進國際人士對中國的同情與支持，有一定的貢獻。

陳弘逸的〈重慶報刊對中國駐印軍之描寫：以蘭伽訓練基地為中心〉，從宣傳的角度，以重慶報刊對中國駐印軍的報導，藉以了解蘭伽訓練基地的環境、訓練經過以及裝備等；另一方面，藉由報導蘭伽訓練基地「較國內優良」的環境，進一步吸引國內知識青年從軍。中國駐印軍是第一次緬甸作戰結束後，在中、美、英三方角力之下，以圖共同對抗日本所形成的一支軍隊。以從緬甸戰場撤退至印度的國軍新 38 師與新 22 師為主，在印度蘭伽訓練基地進行整編。作者認為從報刊中對於中國駐印軍的報導，將蘭伽訓練基地視為中國部隊現代化的一個成功經驗，而其成果也在之後第二次緬甸作戰中獲得證實。

其次，「外交角力」以中國遠征軍組建前後所涉及的外交事務為主題，共收錄四篇論文。

謝瑞齡撰寫〈1940 年華軍入越計畫的外交角力〉，探討國民政府於 1942 年組建中國遠征軍之前，曾經在 1940 年法國淪陷、日本乘勢進入法屬印度支那後，為了保衛西南邊界，計畫派軍隊進入越南北部，以協助法越當局抵抗日本。作者認為中、法兩國在日軍進入法屬印度支那的過程中，原本存在合作的機會與空間，但是法國為了維護其在法屬印度支那的權力，並忌憚於日本軍事力量的威脅，對於國民政府關於中、法合作的提議，多所猶豫，最終使得法屬印度支那成為日本南進的基地，進一步幫助了日本南進政策的實現，走向了太平洋戰爭的爆發。

左擎的〈史迪威的「中國經驗」與第一次緬甸作戰〉，旨在探討史迪威的「中國經驗」對於其指揮第一次緬甸作戰的影響。史迪威在成為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之前，曾經分別以遊客、武官等身分四次來華，這四次來華的經歷逐漸累積成他的「中國經驗」。作者認為這些「中國經驗」讓史迪威對中國有著既定的印象，而後當史迪威以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來到中國時，他與蔣中正對於這個職務的不同認定，形成兩人紛爭的導火線。隨著第一次緬甸作戰的失利，兩人的紛爭由暗轉明，進一步影響到史迪威與中國對第二次緬甸戰的準備。他指出「史迪威的困境，完全是因為他對中國軍隊的不了解，以及未能妥善處理與蔣中正夫婦的人和問題所導致。這對於史迪威這位中國專家，無疑是一件相當諷刺的事情，因為他中國專家的名聲，正是來自於他過去對中國民情以及中國部隊進行的諸多研究。」

鄭紹鈺的〈駝峰兩面之爭議：美國對華租借物資在緬甸戰場與中國戰場的競爭（1942-1945）〉，運用目前文獻上幾無討論的資料——由美國行政部門向國會繳交的“Report to Congress on Lend-Lease Operation”，對於「駝峰兩面之爭議」提出新的解釋。作者認為中美在租借物資使用的優先順序上，會產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有兩個：第一個是出於美國「先歐後亞」的戰略，美國投入中國的物資可謂杯水車薪；第二個則是美國在租借物資的管理制度上，對於中國，強調以租借物資作為威逼利誘之談判工具，沒有辦法讓中美有效溝通其優先順序，反而造成了更多政治衝突。作者在文中提到租借物資有「互惠」的特性，除了美國給予中國租借物資，中國亦須「回惠」租借物資予美國。作者指出中國為了支付回惠租借物資，加重了從抗戰爆發以來便岌岌可危的財政負擔，並以通貨膨脹的惡化為成本。他說：「『駝峰兩面之爭議』，從軍事物資使用的分歧，到政治衝突，乃至經濟民生上的苦果，是中國八年抗戰『慘勝』的一個縮影。」

王立本的〈承先啟後：中國駐印軍戰車訓練班的創立與傳承（1943-1949）〉，將重點置於中國駐印軍戰車訓練班的創立以及後續的影響。作者認為國民政府在1930年代成立的交輻學校（陸軍機械化學校），以及1943年春，成立於印度的中國駐印軍戰車訓練班，兩者之間有著承先啟後的關聯

性。以前者開始有系統的由觀念到裝備，培養出正規專業的人員，然後投入到其後成立的裝甲兵團與陸軍第 200 師之中，並參與了抗戰的行列，有了豐富的作戰經歷和驗證機會。後者則是適時填補了中國裝甲兵幾年作戰下來的損失，更是得到美軍方面的支持與指導，得以與當時同盟國最先進的軍事體系和訓練機制連結，人員與裝備效能因此達到高峰，故能於 1944 至 1945 年的緬北反攻作戰中發揮巨大威力，建立輝煌戰功。

中國遠征軍（包括中國駐印軍）的兩次緬甸作戰是國軍戰史上少有的域外作戰，無論在對日作戰，或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均有其特殊的歷史地位，然而因為多方面的原因，中國遠征軍的研究直至近十餘年才逐漸展開。本書所收錄七篇論文，所涉及史事只是中國遠征軍極小的一部分，而各篇論文所引用資料，主要來自國內各史政機構所庋藏檔案，兼及於部分美國方面資料。實際上，中國遠征軍從組建、發展到作戰，除中、美兩國外，還涉及包括日本、英國、緬甸、印度等國，而這些國家的資料在目前中國遠征軍的研究中鮮少觸及，這也顯示中國遠征軍的研究尚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，有更多的資料等待研究者發掘。當越來越多不同國家的資料出現，中國遠征軍的歷史會更為世人所知，同時也更能呈現中國抗日戰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貢獻。